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三大体系”：理论阐释(上)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迁，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全面阐释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简称“三大体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对于当今中国的学术界而言，科学把握“三大体系”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联系，深入挖掘“三大体系”建设的发展逻辑和发展规律，积极探索“三大体系”构建的方向与路径是时代交付的一项重大任务。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委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展开专题研讨，成果将分为“理论阐释”和“路径探索”两辑刊出。

张政文教授指出，应科学把握“三大体系”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联系，自觉遵循“三大体系”建设的发展逻辑、发展规律，立足伟大实践、坚持科学指引、把握重点要点，实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李凤亮教授认为，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动力，话语体系是核心与关键，学术体系围绕学科体系展开，并通过话语体系的创新呈现出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在面向传统、面向时代、面向未来中坚持古为今用，强化问题意识，加强创新驱动。雷磊教授指出，应在学科体系建设上返本开新、交叉融合，在学术体系建设上直面问题、筑造传统，在话语体系建设上彰显自身特色又契合世界潮流，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求得“戴逸之问”的破解之道。郑崇选研究员建议通过“三大体系”的构建，在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融通中，基于中国实践、发现中国问题、讲好中国道理，推动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自主知识体系。熊易寒教授认为，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是一种嵌入性自主，其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嵌入世界知识网络；二是嵌入中国的社会实践和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三是嵌入跨国的、跨学科的知识社群。刘梁剑教授指出，“三大体系”需内外相合，体系化的理论建构所成就的理论体系应该是贯通的而非封闭的，面对“代际跃迁”的历史大变局，我们需要传承开新，探索属于新时代的“活泼泼”的“三大体系”。

——主持人 叶祝弟 张蕾

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三大体系”的逻辑关系

张政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黄埔高研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南开大学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哲学社会科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的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呼唤着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造与学术繁荣，也给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将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基本的目标指向和实践遵循。思想理论的力量首先表现为逻辑思维的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体现的“稀有的逻辑力量”^①一向为后世称道，思想理论的创新创造也应符合逻辑规律。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应科学把握“三大体系”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联系，自觉遵循“三大体系”建设的发展逻辑、发展规律，立足伟大实践、坚持科学指引、把握着力重点，实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 把握“三大体系”的逻辑关系

作为人类理论思维的产物，哲学社会科学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呈现出不同的知识形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要求就是建构具有主体性、自主性、原创性的知识、观念、方法、命题、理论等，即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自主的知识体系中的“知识”，就其形态而言，主要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其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及与人的关系，都与自然知识指向的“客观知识”有着重大区别。我们说要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主要是指形成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如

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新的研究对象、知识命题、知识概念、研究范畴、知识方法，在理论创新创造中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根本上讲，学科、学术、话语是一个时代知识总体的具



①《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页。

②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4页。

体呈现，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随着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构得以实现的。因此，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逻辑关系，首先要把握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关系。

“三大体系”建设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提供学科支撑。何为学科？“学科”一词译自英文“discipline”，包含作为知识的“学科”和为“学科”服务而建立起来的组织两层含义，其本质是以知识系统、科学分工、产业结构为基础的学科设置、专业划分和人才培养体系的集合，而知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华勒斯坦指出：“学科也就是知识的分门别类。”^②学科是通过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整合与规范处理，而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且稳定的知识体系。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的技术兴趣，由这一兴趣导致的知识累积为‘自然科学’





传统；人与人的关系中产生的实践兴趣，由这一兴趣导致的知识累积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阐释学传统’。”^①何为学科体系？各个学科因其研究对象、内容、方法的特殊性成为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独立学科，同时又因特殊性所蕴含的普遍性而相互连接、相互支撑，进而构成一个包括诸多学科门类，具有全局性与整体性、现实性与前瞻性意义的学科体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既是对已有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逻辑划分，也具有开拓新的知识领域、建构新的知识体系的重要作用。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基本指向就是以时代和中国为观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经验、重要成就、重要思想、重要观点、政策主张等进行学科化把握，不断丰富发展、建设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范畴、概念与理论体系，支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三大体系”建设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提供学术支撑。何为学术？学术的本质是通过科学反映、论证客观对象的本质、规律而不断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并将其用于推动工作、指导实践、改变世界。何为学术体系？学术体系是对学术研究论域、学术研究方法、学术研究成果等予以理论化、系统化而形成的理论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体系，是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的融合融通。一方面，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离不开理论知识体系的发展。理论知识体系包括概念、思想、理论、观点、学说、知识、原理等，我们应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

力提出具有自主性、主体性、原创性、时代性的新思想、新观点，彰显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身特色，形成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显著优势。另一方面，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离不开研究方法体系的发展。研究方法是获取真理性认识的利器，面对奥妙无穷、复杂多变的外部世界，怀特海把研究方法看作“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新鲜事物”。^②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桥”或“船”，这个“桥”或“船”就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不断创新包括思路、策略、技术、程序、工具等要素在内的研究方法，并形成新的研究范式，才能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并以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三大体系”建设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提供话语支撑。何为话语？应将对话语的考察置于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下加以分析。话语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句子、命题和言语，而是社会主体借助语言、文本等符号进行的意志表达。何为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某个学科或知识领域形成的相对稳定、独立的言说体系与表达形式，是一定时代社会发展、历史积淀与文化传统的综合表达，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外在反映，是以特定符号、特定言语指导、影响、形塑公众思维方式、言说方式、行为方式的规范结构。话语体系主要包括概念、命题、术语、语言、判断、范畴等，作为话语体系的基本构成元素，概念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维成果，其使我们能够更为清晰地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由此，概念的澄清与界定成为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前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认识和经验的完备系统，包括符号代码、语言表达、学术理念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③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应以概念的澄清与界定为基点，努力形成本学科领域的知识图谱、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自主知识体系软实力的表征，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而这些都离不开话语体系的构建。

① 汪丁丁：《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1页。

② A. N.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94页。

③ 彭澍、袁军：《以核心术语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9日。

在学科、学术、话语融合发展中把握 “三大体系”的逻辑关系

恩格斯说：“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①唯物辩证法既是观察、认识、说明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又是指导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融合发展的思想利器，为正确把握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辩证关系，实践推进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本质上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彼此区别、各有重点，但在建设内容、功能作用和具体实施上又相互融合、相互支撑，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构成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三位一体”建设格局。

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本依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②哲学社会科学以学科的方式发展，成体系的学科理论构成学术体系，成体系的学科概念构成话语体系。因此，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学科体系是基本依托，规定了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视角、发展方向与建设内容。一方面，学科的性质和任务规定并引导着学术体系建设。学术体系以全局的、整体的学科体系为基础，通过对本学科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的集成创新，来形成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和方法体系。制度化的学科建设让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累积与学术研究变得自然有序，同时吸引着具有相同学科背景、研究兴趣的研究者不断加入而形成学术共同体，从而有效推进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学科体系的创设与发展为话语体系的建设预留了表达空间。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完善，就难以为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可靠的理论、概念、范畴、表述支撑，就会出现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窘境。因此，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首先要提高学科体系的建设能力与水平。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支持和布局更多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专业，实现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的学科建设目标，打造有力支撑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实力支撑。学术体系既是连接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中介枢纽，又是支撑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内核。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支撑学科体系的创新发展。每一个学科都有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学术体系共同构成了科学化、层次化、条理化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可以说，学术体系的发展状况影响、决定着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水平与能力。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支撑着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不同的学术体系，会产生和支撑具有不同思想指向、价值取向的话语体系。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实力，在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中占据世界主导地位，进而垄断了对学术体系中概念、思想、观念的解释权，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西方中心主义。而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一度缺乏自主性、主体性、时代性的原创思想、原创理论，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被动地进行学术思考、理论探索。因此，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还要提高学术体系的建设能力与水平。既要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从学术前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安全、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战略全局出发，聚焦新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6页。



时代命题、知识概念、研究范畴、研究方法，提升思想理论体系的建设能力与水平；又要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聚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创新，尤其是实现新科学、新技术与新研究范式的深度融合，运用新视角、新思维、新方法与新工具，提升研究方法体系建设的能力与水平，进而实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整体推进。

话语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表达体现。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既是学科体系内外联结的桥梁纽带，也是体现、表达、传播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方式载体。一方面，对于学科体系而言，学科的本质是知识分类，这里的知识分类当然包括话语基础、话语核心、话语方式、话语自信、话语传播、话语权力和话语创新等话语知识，不断推进话语体系创新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实践要求；另一方面，对于学术体系而言，学术研究的载体和工具是话语，学术研究的内容需要话语来呈现，学术研究的成果需要特定的话语来表达，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益需要学术话语的传播来达成。因此，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还要提高话语体系的建设能力与水平。应聚焦政治话语学理化，坚持用学术讲政治，并且讲深、讲透，讲出政治话语背后的道理、事理、学理、情理与哲理，以知识的方式阐释好中国之路、中国之治和中国之理。聚焦学术话语大众化，通过学术话语的通俗化表达、形象化展示与大众化呈现，让有意义的事情更加有意思，让思想、理论、学术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聚焦中国话语国际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标识性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学术理论、学术概念、学术范畴与学术表述，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

中国叙事体系，切实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力、文化感召力、形象亲和力、话语说服力与舆论引导力。

统筹推进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立体化建设

“三大体系”建设应立足伟大实践。从总体上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人类的知识生产是在时代发展与社会实践中进行的，唯有激荡的大时代、宏阔的大实践，才能孕育创生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和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汉密尔顿等人著的《联邦党人文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著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①实践是知识生产的源泉，仅仅停留在原理层面，是不可能推动理论创新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和任务就是把中国实践、中国发展、中国经验创造性地转化为哲学社会创新发展的学科内容、学术理论、研究范式和知识话语，统筹推进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应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迫切需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统筹推进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立体化建设，努力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和实践问题，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三大体系”建设应坚持根本指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与其研究者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8页。

论紧密相关。统筹推进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立体化建设，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引。首先就是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把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始终坚持自信自立，在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中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应坚持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学术上的独立自主。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积极推进“三大体系”的创新发展，不断拓展理论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等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始终坚持系统观念，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来把握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实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整体推进、融合推进和全面推进。始终坚持胸怀天下，既立足中国实际，又开门搞研究，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有分析、有鉴别，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积极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合理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积极回应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

“三大体系”建设应把握重点要点。统筹推进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立体化建设，应善于抓住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学科体系而言，其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加强交叉学科建设。应整体布局学科的交叉、重组与退出，大力发展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系统学科、横断学科，特别是构建量化社会学、量化历史、

数字考古学、计算传播学、计算政治学、科技金融学、空间计量技术与经济学等文理交叉学科群，从微观到宏观各个尺度纵深推进文理多点突破、交叉融合，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学科支持。就学术体系而言，其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推进有组织科研。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的《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要求“以有组织科研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创新”。^①有组织科研的“强组织性”，具有打破学科壁垒、统筹资源配置、强化力量集成、形成创新合力、畅通转化链条的特征与优势，使得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变“无序”为“有序”、变“分散”为“聚合”、变“无组织”为“有组织”、变“学术导向”为“需求导向”，对于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价值。当前，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情况，因此必须加强学术话语权建设，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形成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理论、学术概念、学术范畴与学术表述，全方位展现“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不断提升和巩固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印发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人民日报》2022年5月28日。



目前,我国“三大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相关研究也在逐步跟进,但关于如何评价“三大体系”的问题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一致的评价标准体系。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克服“唯分数、唯升学、



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要求。^①多年来,“五唯”评价体系一直是我国学术评价的标准,它以定量评价为标准,是在西方评价标准的驱动下逐步形成的,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办学道路、教育评价体系和学科分类体系,不利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②因此,建立基于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扎根于本土实践的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破除我国长期以来所面临的学科专业边缘化、学术体系不完善、话语解释力不足这三重困境的有力武器,能够及时发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相应的评价指标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③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三大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推动力,话语体系是核心与关键,学术体系围绕学科体系展开,并通过话语

“三大体系”如何因应时代之变

李凤亮,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院长,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

体系的创新来呈现。^④话语体系作为“三大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一方面,话语体系涉及整个学术体系的构建,决定了学术体系的质量和水平,也反映了学术体系的创新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话语体系对于人才培养至关重要,因为在话语权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其课程体系的设置和研究领域的设定必然会存在不均衡性问题,严重妨碍国际人才的培养。没有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就没有生命力,强化话语质量更是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

话语体系作为“三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和话语呈现,也是衡量一个学科是否具有深厚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更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对外部西方霸权话语与内部话语建设不充分的双重挑战,中国如何走出话语困境,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迫在眉睫。立足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不忘本来,坚持古为今用;驻足时代,立足当代现实,强化问题意识;面向未来,致力话语创新,加强创新驱动。三大路径既回溯历史,又立足当下,也展望未来。

不忘本来,坚持古为今用

话语体系是基于实践,以特定符号来表达某种观点、思想、理论和知识的概念、术语、语言等,是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借用布尔迪厄所言,“专门化的话语能够从社会空间的结构与社会阶层场域的结构之间所暗藏着的对应中获得其效验”。^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重点在于“中国特色”。

何为中国特色？其内在的基因密码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内核，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依旧保持中国特色的因由。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⑥可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何等重要。十几年前，笔者在访谈美籍华裔学者王德威教授时，他曾这样说道：“过去我对于文学跟历史的讨论更集中在20世纪文学和20世纪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相互印证的过程的话，那么过去五年中，我越来越认识到视野应该投向一个更广大的历史语境中。这个历史既是一个生活经验不断累积的历史，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本行——文学史。”^⑦他强调在谈论中国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时候，不能忘掉历史性，也就是不能忘记传统。

毫无疑问，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能脱离传统。那么在面对内容丰富的传统文化时，要继承和弘扬的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费孝通先生提出要“文化自觉”，也就是说对于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能够对其有充分的认识。例如，要识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既不能全面“复旧”，更不能全面“西化”。一方面要继承传统，汲取传统文化的深沉智慧；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对传统的概念、术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避免简单照搬照抄。换言之，话语体系的建设应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在继承与发展中展现中华文化的永久魅力，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学术命题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在学术研究中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虽然学界对于该命题持有不同观点，但从中国文论或者文艺学的发展来看，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与建构必须继承中国古代文论的优秀成分，注入时代精神，建设符合现实且具有强大阐释力的新文论。另外，中国文论失语

症出现的根源也正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忽视，以及将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两者之间对立起来。继承传统是中国文论发展的力量源泉。例如，现代文论中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观念，是对古代文论中儒家“文以载道”思想的继承、延伸与发展。^⑧总体来说，话语体系是国家在国际上取得话语权的根基，继承本国优秀文化是构建话语体系的基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不忘本来，坚持古为今用，将话语继承与话语创新相结合，在吸收借鉴中华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驻足时代，强化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贯穿其发展始终。马克思曾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它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⑨这一论述充分阐释了问题与时代的关系，认为问题的提出来源于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时代的必然性。^⑩这也就是说，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是时代变化与社会实践的产物，其发展要立足时代与实践需要，具有问题意识。坚持问题意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质，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突出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问题的重要性如何”“如何解决问题”^⑪这三个核心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并反复强调要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谈及世界观和方法论时，明确提出“六个坚持”，其中第四个就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⑫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建设应以中国为关切，以时代为观照，立足当代现实，坚持问题导向，在时代变化中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来推进话语内容及表达方式的转变和创新。如前所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面向传统，其实面向传统、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它是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首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全面了解当前我国话语体系建设所处的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困境，从问题中寻找解决办法。例如，在学术评价体系方面，我国一直受西方话语体系所影响，并且一直依赖于西方标准体系，“五唯”评价体系则是很好的例证。同时，在治理评估体系上，指标体系虽然强调价值中立，但仍然未跳出以西方发展模式为标准的治理评价。杜赞奇就曾说过：“对于欧美以外地区的解释必须奠基在其自身历史发展的经验、轨迹当中，不能够简化地、错误地以欧美经验来丈量、解释自身。”^⑬这就要求我们应以全球眼光，探索立足于本国实际的理论评价体系。

其次，坚持问题意识要求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立足于中国实践，提炼出中国话语，克服“有实践没概念”的困境。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纵观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是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制胜法宝。我们要加强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概括和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新模式、新理论，推出能够解决人类问题的新方案、新路径。特别要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学术话语体系，^⑭突出话语的大众化特征，打造易于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要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解决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它是对西方价值观的超越，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具有普遍性的全球价值观。

最后，要进一步强化学理共识，寻求思想公约权。要从实践中深入挖掘目标共识、思想共识、价值共识、表达共识，^⑮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民族复兴”等核心理念，提炼出具有标识性、世界性、大众性且具有学理性的新表述，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学术自信和理论自信。

面向未来，致力话语创新

创新是理论永葆生机的源泉，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动力。加强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设中反复强调的重要内容。“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⑯原创性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同时，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话语体系仍然存在“西强我弱”的现象。西方国家在国际话语权中占主导地位，我国话语体系建设和话语主权捍卫既面临着外部压力，也存在内部话语原创性不足、创新性不够等问题，话语体系构建还无法与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等相匹配。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着眼于创新，通过思想创新、内容创新、传播方法创新等实现话语体系新飞跃。

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充分发挥其在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思想引领作用。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二是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面向未来持续丰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内容，激发中国话语的创新潜力。创新总是

在吸收借鉴中不断向前发展，也就是说善于借鉴才能善于创新。这就要求我们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广泛吸收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与实践经验，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打造出更具有世界性的话语体系。

三是不断强化话语体系的传播能力，提高中国话语的影响力。一方面，注重话语的大众化和国际化表达，用通俗易懂且贴合西方受众的表达方式来进行国际传播，为强化话语传播工作提供表述支撑，也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例如，在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内容进行传播时，应通过“讲故事、摆事实、举例子”的方式，应用具有穿透力和解释力的话语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实现政治话语的大众化表达。另一方面，创新对外宣传方式，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平台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对外传播，特别是注重新技术对于话语传播的作用。例如，ChatGPT 作为一项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由于它的训练数据主要来源于西方数据库，其思维运行模式更符合西方受众的喜好。^⑩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这些传播工具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力，“借船出海”厚植理论话语，以更具共情和国际表达性的方式全方位加强国际传播。^⑪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途径研究”（23ZDA081）阶段性成果。】

注释：

- ① 参见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民日报》2018年9月11日。
- ② 周光礼：《破“五唯”立新标：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三大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组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进程评价：理论与实践探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1期。
- ④ 潘玥斐：《“三大体系”建设引领哲学社会科学迈向未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2月22日。
- ⑤ 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褚思真、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页。

- ⑥ 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 ⑦ 李凤亮：《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 ⑧ 朱立元：《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290页。
- ⑩ 苑申成：《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逻辑理路》，《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7期。
- ⑪ 关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问题”的科学理解和求解》，《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 ⑫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 ⑬ 杜赞奇：《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页。
- ⑭ 靳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红旗文稿》2019年第23期。
- ⑮ 韩庆祥、陈远章：《建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光明日报》2017年5月16日。
- ⑯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 ⑰ 郭晓科、刘俊、王瑾：《全球话语竞争下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新思维》，《对外传播》2023年第5期。
- ⑱ 本文写作得到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学会青年会士、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杨辉博士支持，特表感谢。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戴逸教授针对当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消极的判断，即“法学是幼稚的、史学是混乱的、经济学是贫乏的、哲学是危机的”。这些判断指出了当时中国哲学社会

“三大体系”建设与“戴逸之问”的破解

雷磊，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院特聘专家，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科学发展的方向性困惑，并被后来者称为“戴逸之问”。自此，众多学者将探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向何处去”作为重要论题，并孜孜以求破解之道。

阶段。^①虽然法学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但对其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描述大体上也适用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可以说，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卓有成效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学者们开始隐约有意识地去把握和聚焦本学科的基本立场，但又缺乏有效的抓手和路径。

在这一历史节点上，2016年中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基本命题，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内核，话语体系是表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熟的根本之道，就在于这“三大体系”的一体建设。那么，我们未来当如何推进“三大体系”建设，以从根本上破解“戴逸之问”？

返本开新 交叉融合

应当看到，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今日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已不可同日而语。以法学为例，舒国滢教授曾将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学基本上处于“幼稚”的状态，当时中国社会的制度实践倒逼着中国的法学学者改变知识被动的局面，所谓“只争朝夕”“跑步前进”；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专业法律学术开始成长，但大家几乎都忙于“跑马圈地”，为中国法学未来的走向盲目划界，所以这种刚露端倪的专业法律学术是在“争执”与“漫无目标的追寻”中度过的；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之后，中国的专业法律学术（法教义学）处于沉淀时期。出于法学知识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需求（“法律科学”的诉求），中国法学到了知识更新或升级的

学科体系建设既要考虑本学科的内在构成逻辑，也要考虑专业教育的实践需求和学科的未来发展。任何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都有自己的内在构成，成熟的学科体系建设既要“补短板”“强弱项”，也要“固根本”“利长远”。以法学学科为例，近年来，我国法治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不断提高，形成了多类型、多层次的法学教育体系，建成了种类齐全、内涵丰富的法学学科体系。同时，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社会亟须的新兴学科开设不足，法学学科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不够，知识容量需要扩充。^③目前的新文科建设，要义就在于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在动态化调整和整体性

① 参见舒国滢：《求解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的“戴逸之问”——舒国滢教授访谈录》，《北方法学》2018年第4期。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③ 参见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74—175页。

推进中培养一专多能的专业人才。

以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为例，我们可“窥一斑而知全豹”。具体而言，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法学学科内部的交叉，如民行交叉、行刑交叉、民刑交叉等；二是法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文一文交叉），如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三是法学与自然科学学科的交叉（文一理交叉），如地理学、工程学、生物科学等。但要注意的是，这种融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法学分支学科，因为它们并不像法教义学那样严格对应于特定部门法，而更多属于以问题为导向的领域法学。^①例如，目前发展最快的“数字法学”在结构上主要包含网络法学、数据法学、人工智能法学三个板块，^②但无论哪个板块，当下还不构成制度意义上的独立部门法学，而只构成法学教育和研究意义上的领域法学。同时也要看到，新兴学科建设绝非简单地设计“法学+”课程体系，也即平行地抓取几门传统法学类课程和其他学科课程进行“配方”，而是要研究这些新现象、新路径、新方法的引入对法学研究的挑战，以及法学的回应方式。此外，在进行新兴交叉学科建设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乃至放弃传统学科建设。法学传统学科，尤其是诸部门法学作为法学学科的基本，与新兴交叉学科不是此消彼长，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交叉融合需要“以本为本”，在既有法学知识的基础上“做增量”。法学学科自主性的根底就在于传统学科，丧失了这些学科基本，也就丧失了交叉融合的前提和基础。当然，面对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挑战，传统学科也不能故步自封，而应积极发挥新科技法律问题作为传统理论“试验田”的功能，要么通过既有的教义学原理来容纳化解新的挑战，要么以此为契机来推动传统学说的更新。

对法学学科的分析启示我们，传统学科既要因应新环境对旧体系的“激扰”，不断进行知识创新，也要保持对社会现象的普遍解释力，而非像新兴交叉学科那样仅针对新领域、新问题提出特定解决方案。总之，在交叉融合的背景下实现返本开新，能够使得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既有实践需求的针对性，也能维系学科基本的长远发展。

直面问题 铸造传统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的要义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直面中国社会的实践及其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服务于实践。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服务于中国的社会实践，应对和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十几年前，哲学家陈波在反思中国哲学研究时曾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界的绝大多数学者、绝大多数资源都投向了哲学史研究。几乎整个中国哲学界都在做哲学“史”，没有几个人在真正地做“哲学”；几乎所有人都在研究他人的哲学，没有几个人在做原创性研究，发展自己的哲学；几乎所有人都面向哲学的过去，没有几个人“活”在哲学的现在和当下，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对此，陈波提出，中国哲学家要面对真正的哲学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因为哲学的源头活水永远是问题，真正的问题。^③这一观察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例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法学者就热衷于“洋学问”和“洋案例”，忽略对中国法治实践、中国案例的关注和研究，只关心他人（西方经典法学家）说了什么，（欧美国家的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做了什么，无视中国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这一状况在近些年有很大好转，但也要谨防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不断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拒斥一切外来的思想。中国社会实践的“问题”有可能不仅仅是“中国的”，也可能是世界的，个别现象的背后或许隐藏着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同样，针对中国实践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在理论效域上也可能不仅仅止于中国，而是具有面向世界的普遍价值。就像“中国式现代化”不等同于“中国的现代化”，因为“式”本

① 参见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政法论丛》2016年第5期。

② 参见姜伟、龙卫球主编：《数字法学原理》，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

③ 参见陈波：《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晋阳学刊》2010年第4期。



就指范式、模板。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发源于中国的社会实践”，但不意味着“只适合于中国的社会实践”。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根本旨趣，在于在起源于西方社会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外，提供一套起源于中国社会实践，但也同样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新范式。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也要筑造自身的学术传统。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决不仅是对当时当下特定中国社会实践的一时反馈和政策回应。即便是法学这样实践性比较强的学问也不能完全是对策性研究，更不能完全消解在政治话语之中，而是要构筑自己相对稳定的学理传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构建要贯通三个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贯彻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即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而非僵化地复制其针对特定历史情境的具体观点。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要注意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理、伦理、道理、法理，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也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契合和服务当下的社会实践。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在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前提下，还应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但决不能照搬外国模式和做法，而要做到识别有据、借鉴有度，最终达到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结合。^①

由此，将马克思主义之“道”，中华文

明之“根”和国外优秀哲社思想之“器”结合起来，方能铸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学术传统。要强调的是，传统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沉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要为自己留下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学理上的积淀、提炼、归纳和创新，也要留下足够的空间进行选择、比较和“试错”。此非朝夕之功，而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提炼标识性概念和范畴。2023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要求：“紧紧围绕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切实加强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学理论研究，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不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正如张文显教授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就类似信息技术中的芯片，可称之为“思想芯片”。^②“思想芯片”是科学提炼出来的概念、范畴。概念、范畴是认识的结晶和知识体系的元素，是衡量一个民族理论思维水准的尺度。知识体系的存在形态是概念体系，概念体系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核心概念，起基石作用并可能成为研究范式的则是基本范畴。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政治学中的“国家”“民主”“国体”“政体”、法理学中的“法理”“权利”“义务”“责任”、当代中国法学理论中的“法治体系”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把“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结合起来，打造既有深刻思想内容又有精密结构的“思想芯片”。要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就要提炼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己的原创性概念和范畴，加强对普遍概念和范畴的新内涵研究，并发掘这些概念和范畴的内在联系，打造出内在勾连而又错落有致的理论体系。

彰显特色 契合潮流

2011年，中央提出以对中国实践的创新性解读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全

① 参见雷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国家治理》2022年第16期。

② 张文显：《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法学家》2023年第2期。

球范围内争夺话语权的重大任务。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①然而，12年过去了，我们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占领世界话语体系高地和掌握国际话语主动权的能力仍显不足，特别是在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领域，“西强我弱”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这与西方话语占主流地位的历史惯性有关。所幸的是，至少在中国法学界，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做出有意识的努力，今年先后出版的《新时代中国人权故事》《中国法典型案例》等就是阐明“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积极尝试。但除此之外，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尚需付出更为系统的努力。

话语体系的建设要与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构同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内在逻辑和概念对外发声，坚决反对理论话语上的殖民主义，坚定走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待、文明互鉴、携手共进的共同现代化之路。既不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理论话语，也不强行输出本国的理论模式，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唯需注意的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性”并不意味着它的“孤立性”和“不可通约性”。“中国特色”和“中国性”只表示这套话语体系由中国学者提出，起源于中国社会实践，具有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内容和主张，并不意味着它只能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或者仅着眼于与西方话语体系对抗的一面，而没有相通相容的一面，更不意味着自我孤立和自我封闭。因为既然要对外发声，也就潜在蕴含着可被普遍接受和可通约的诉求，要契合普遍的世界潮流。

契合普遍的世界潮流要求在同一话语层面上建构新话语体系。政治话语要用政治话语来反击，而法律话语则应用法律话语来反击。例如，当美国运用“长臂管辖”理论来对其认为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国外公司和个人进行制裁时，我们就不应仅停留于谴责对方霸权主义行径的政治话语层面，而应创造出与“长臂管辖”理论相对或可对其进行限制的法律理论，并且能

预见到这一理论可为其他国家所接受。虽然每种法治主张的背后都有一定的政治角力和利益诉求，但一种站得住、说得开的法律理论能以更易于传播的方式来保护国家的安全、主权和利益。契合普遍的世界潮流也要求新话语体系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但不同文明间又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就是不同文明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的最大同心圆。党的二十大报告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②因此，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不能违背国际公认的基本原理及其背后所体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例如，“法治”的最低限度内容——法律至上、保护权利、限制权力——就应在当代中国的法治话语中得到维系。从根本上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应当面向国际社会的现状，从依照西方话语“照着讲”，发展到超越西方话语“接着讲”，参与到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去，参与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当代建构中去。

怀国之大者，树科学典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未来的发展，应在学科体系建设上返本开新、交叉融合，在学术体系建设上直面问题、铸造传统，在话语体系建设上既彰显自身特色又契合世界潮流，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求得“戴逸之问”的破解之道。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研究”(2022JZDZ003)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经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交融交汇，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



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整体性、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成为世界文明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进程不相适应的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还没有做出充分的回应和解答，基于中国实践所形成的中国故事和中国道理还没有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认可，我们尚未从学术上构建出能够深刻概括这一伟大实践并与之相匹配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三大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总体战略，如何在融通生成的基础上全面、彻底彰显中国特色是建构“三大体系”的核心任务。何为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何以可能？如何做到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通向哪里？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的题中之义。

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特色和根源

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传统中国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建构

“三大体系”何以彰显中国特色

郑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方式曾经造就了中国学术思想的灿烂辉煌，其文化影响及思想辐射形成了东方文化的主体形态，为周边国家所长期学习和模仿，特别是在东亚一直处于文明辐射中心地位，至今依然能够在东亚为主的广大区域内有直观生动的感受。从主体性的角度来理解传统中国的知识生产过程，无论是在对内的文化认同，还是对外的话语输出，传统中国自身已经成为普遍性知识的建构者，其影响所至的他国则是“特色”焦虑的主要对象。这种认知并不是对往日辉煌的沾沾自喜，而是要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语境中有一个清晰的历史感和方位感，时刻提醒我们在哪里找寻主体性，哪些资源是我们必须不断传承的，我们的文化主体性的特色和根源在哪里。

文化主体性的问题总是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与不同时代的文化认同危机相伴而生、如影随形。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文化发展道路在中西文明的交融与冲突中不断进行着痛苦而矛盾的选择。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与全面引进曾经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至深影响，无论是全盘西化的极端，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务实，都从不同的维度强调传统中国文化的新生迫切需要西方文化的内在滋养。五四运动的狂飙突进与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化的狂热吸收无疑在很多层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反思，也使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面临很多复杂的挑战，从而产生了文化主体性缺失的时代危机。

近代以来，在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浪潮中，以阐释西方社会发展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得到极大推动，产生了各个学科的学术规范和话语系统，并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开始大规模地向外输出，对世界范围的社会科学研究形成了先入为主的知识体系霸权。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相适应，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相应的一整套知识体系也在话语霸权的背景下被很多国家所接受和沿用，包

括对现代化孜孜以求的中国。由于中国的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无论是在方式路径、运行机制、评价方式，乃至在价值取向、文化追求等方面，都存在内在而根本的差异，因此，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命题、概念、理论、范畴等，有些学者甚至亦步亦趋，完全对标西方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文化主体性无从谈起，更为严重的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已经内化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相当一部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都是套用西方的理论来构筑分析框架，选取符合分析框架的个别中国经验和实践，为理论的阐释添加一些可有可无的“注释”，看似是严谨规范的学术成果，实际上让渡了学术和思想的主体性。建立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基础上的诸多理论和概念，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时面临叙事能力贫弱等问题。

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与巩固根源于在世界多样性文明中阐释和激活传统，推动传统价值在主体化的过程中建构我们的现代价值。中国式现代化已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作为他者的西方文明只能是我们建构自身文化的参照系，只有顺应人类文明发展主流，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才有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未来。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要求有非常典型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质，是中国人民生活世界和普遍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从延续不断的中华文明中生长出来的、来源于传统却又超越传统、充满活力与韧性的崭新生命体；另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要与世界现代文明兼容共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引领未来世界的发展，为世界局势注入稳定的发展动能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从这两个方面去考量，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就显得极为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意义。只有确立了新时代的文化主体性，“三大体系”才具备了“根”与“魂”，构建和形成的过程才会变得不可阻挡、顺理成章。

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关键是深刻把握和彻底坚持“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为“三大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空间和理论视域，激活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原创性”的内生动力，从文化的角度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构建如果

脱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语境，脱离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灵魂，就很难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理论贡献，很难说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巨大阐释能力。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开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中西文化的吸纳贯通为全球文明的延续、发展提供中国经验。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不断构建广大中国人心灵图谱与文化身份的同时，也为人类文明境界的开拓与提升贡献了卓越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提炼基于实践的标识性概念、 标识性范畴和标识性话语

实践自觉是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重要基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在各领域的系统实践中发现和找到支撑“三大体系”构建的真问题。这些问题应具有内生性、原发性，是全新的经验系统和知识场域，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和学科化把握。中国的经验固然源自中国的实践，有明显的中国特殊性，但中国经验也是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的实践形成的，所以又有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离不开对中国实践的经验总结，只有建立在充分的实践自觉基础上，深刻揭示实践、服务实践并指导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才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

中国正在经历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三大体系”的构建要以中国实践为基础，



赋予学术概念、命题、理念以新的含义，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提炼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命题和新理念，同时，让中国特色话语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三大体系”构建过程中，问题的寻找和把握是非常核心的学术环节，找到了属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真问题，就等于规定了中国特色得以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有些研究者会把他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并且以学术的名义开展研究，貌似是在理论的推导和使用中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但放置于中国实践中去检验和评估，就会发现内在的缺陷和与中国实践的隔膜。这种悬浮性学术研究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我们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也不是玩简单的智力和理论的游戏，而是要通过“三大体系”的构建回应和解答中国之间、世界之间、人民之间、时代之间。比如，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体系与理论创新，虽然其最初的推动力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浪潮，但其实践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启。1931年，瞿秋白在《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一文中就使用了“现代化”一词。20世纪30年代后期，“现代化”在党的文献中成为常规的词汇，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工业化问题，到延安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展露出初始的生机与活力。

有一种在学术界流传很久的观点，认为学术就是要远离现实生活，远离社会实践，距离越远，说明学术价值越高，即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术真问题的发现、学科设置的创新以及学术话语的表达如果没有建立在对实践和经验的深入把握之上，只是追求理论构建的内循环，所谓“茶杯

里的风暴”，那么其成果虽具有一定的观赏效果，却与广阔的社会生活有很深的隔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考察中西学术发展的大致脉络，能够传至久远、奉为经典的学术著作，无不是与时代、社会或历史的某一视角的深度对话，那种空中楼阁式所谓纯而又纯的学术成果早已被历史所遗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对于当前“三大体系”的实践自觉是一种非常及时的提醒。世界上没有与实践完全脱离的哲学社会科学，任何一个学科优秀的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对实践的学理化认知和把握。

从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势来看，中西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建构方式正在形成明显的区别，相较于西方不断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处理方式，中国则更强调一种基于自身主体性基础上的文明对话，从而建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实践包含了丰富而开放的理论空间，形成了独特的经验、范畴、情感和体验，这些都对“三大体系”带来极大的挑战和机遇，简单套用、移植或是化用西方社会科学的已有成果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基于当代的中国伟大实践，才能凝练出具有“原创性、主体性”的标识性概念、标识性范畴和标识性话语表达，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立足中国实践、发现中国问题、讲好中国道理

当代中国实践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向世界的开放中，把普遍的现代价值融合进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从而形成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现代文明的“现代”即根源于此。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局部性、探索性开放一直到当前的制度型、高质量开放，开放的品格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的基本内涵。强调“三大体系”构建的中国特色，不是简单地把当代中国的理论构建与知识生产放置于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之内，而不再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从全球化发展的历程来看，当前国际格局复杂

多变，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因为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各种因素而矛盾不断，全球范围内的文明互鉴和文化融合面临危机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我们所要强调的中国特色就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基于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之上的应对策略，并且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有些人会认为中国已经可以自己解决任何问题，不再需要交流、对话和学习，只要做好、做足我们的“内循环”就可以保证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伟大复兴。“三大体系”的中国特色不是简单地追求“中国道理”的特殊性，强调中国的学科、学术和话语是跳出世界学术主流价值之外的，不是运用各种理论工具去建构一个只属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而是要致力于研究特殊性中所蕴含的普遍性的知识，既能阐释本土中国的发展逻辑，又能进行跨文化语境的世界交流。“三大体系”一个重要的时代使命就是要回答“世界之问”，其价值与意义在于立足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在与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交流互鉴中走出自己的道路。

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还表现为综合性、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和思想方法。之所以从“三大体系”的总体战略布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在学科、学术、话语之间以及各自的内部形成融合贯通的良好格局，而不是三者的割裂与封闭。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因为分析科学和分析方法的内在影响，研究领域的学科细分成为确定学术研究问题和学科研究话语的重要依据，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而学科的范围却越来越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并成为相关领域专家的一个前提就是要先选择一个具体学科方向。这种学科细分、划分领域的发展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学科之间泾渭分明、自筑藩篱，更为严重的是，每一个具体学科和研究方向的内部形成相对封闭和可以实现价值交换的知识生产，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文性、综合性南辕北辙，完全抛弃了中国传统学术宏大、整体、融合、通透的研究范式。陈平原把这种极端细分的研究趋势概括为：“专业化、学科化、工程化的主流学术”“以项目为中心、以评奖为标的、基本上漠视读者及社会需求的学术生产方式”。^①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面临很多复杂的变局，需要解决很多前人没有碰到的问题，这些变局和问题单靠某一领域的学术理论和学科知识，显然无法很好地应对与处理。“当代中国实践及与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个世界，涌现了太多传统学科视界内感到‘无能为力’的新事物和新问题，固守于传统的学科体系是无法构建起符合新时代中国实践需要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②基于“第二个结合”所提供的思想方法，“三大体系”的构建就是要在传统学术范式综合性的理论架构中探索一条汇通融合之道，在整体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不断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无论是“新文科”建设的呼吁，还是“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院”等跨学科研究机构的成立，都是积极而主动的有益探索。我们期待通过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构建，在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融通中，基于中国实践、发现中国问题、讲好中国道理，推动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自主知识体系。

注释：

① 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视野以及“人文史”构想》，《中华读书报》2022年10月15日。

② 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员：《发展无愧于新时代的中国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何种意义上的“自主”

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构件，但绝不是全部。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是相对的。自主知识体系既不从属于任何体系，也不是封闭的



知识体系，而是嵌入在世界知识网络中的知识体系，是当今世界“开放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哲学层面来看，没有绝对自主的知识体系，绝对意义上的自主就意味着封闭，与外界无法沟通，也无法进行知识交换。在笔者看来，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是一种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只有嵌入全球知识网络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的知识创造为国际学术界所广泛接受，才能形成基于标识性和原创性的自主性。知识创新从来不是自说自话、孤芳自赏，它需要得到知识社群的承认与认同，只有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国的知识创造才能反哺中国社会、服务中国社会，才能形成基于人文性和价值性的自主性。知识生产从来不应该是一场纯粹的智力游戏，而必须服务于人类的福祉。

简而言之，嵌入性自主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嵌入世界知识网络。没有基于一国的独立、封闭的知识体系，而只有相互印证、相互检验、相互观照的跨国知识体系。在这个

嵌入性自主：世界知识网络中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

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意义上，哲学社会科学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是一样的，都寻求具有广泛解释力的普遍规律。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谈道：“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①所谓的“补课”就是让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重新嵌入世界知识网络，在经历了“知识脱钩”之后再度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二是嵌入中国的社会实践和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国学者首先需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进而探寻具有普遍主义的知识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又是有所不同的，前者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性”。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仅仅通过“补课”“接轨”是不可能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而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创造性实践。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党和国家事业将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同样的道理，中国学者必须把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转化为理论之问，才能创造出兼具中国性与普遍性的学术成果。譬如，当我们观察中国社会，如果从微观层面看，会觉得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层出不穷，如信访、拆迁、征地、群体性事件等；但从宏观层面看中国社会又保持了长期稳定。这种“悖论”怎么在学理上进行解释？又如，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对于我们的产业政策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为什么有些产业政策见效明显，有些产业政策收益甚微，甚至得不偿失？只有聚焦当代中国的这些真问题，我们才能做出真学问，才能形成自己的自主知识体系。

三是嵌入跨国的、跨学科的知识社群。任何知识

体系都需要外部世界的承认。学科的自主性和嵌入性相辅相成，自主性是需要被学术共同体广泛认可的，自主性植根于知识界的共识，而不能只是一种自我宣示。学科自主性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相对于其他学科的自主性，如政治学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的自主性，反过来，政治学的自主性需要得到经济学、社会学的承认；二是相对于西方或其他域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同样地也需要域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承认。嵌入性自主意味着特定学科需要与其他学科、与外国同行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无问西东，管用为王。真理和规律永远是学科的第一追求，解释力是第一位的。

自主性何来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嵌入性自主，是嵌入性与自主性的有机统一。如果没有嵌入性，那么自主性就是一种封闭的自主性；如果没有自主性，那么嵌入性就是一种依附的嵌入性。然而自主性何来？在笔者看来，自主性源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设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重要的使命，“三大体系”是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关系。学科体系是“体”，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构成了“两翼”。学科的繁荣发展需要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强有力支撑。

首先，学科体系的主体是学科设置与人才梯队，核心是学科主体性。学科体系要繁荣发展，一是学科设置必须科学，应遵循人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内在规律，一级学科目录保持基本稳定，二级学科目录则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二是人才梯队必须合理，学科的繁荣关键在人，高水平的教学科研队伍是学术创新、学术传承和话语传播的主力军。一个学科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形成自己的学术传统、学术品格、学术追求，不唯上，不媚俗，为人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如果一个学科的视角没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那么这个学科就很难获得外部世界的认可，也很难获得学科持续发

展的外部资源。

其次，学术体系的主体是知识体系和学术训练体系，核心是学术生产力。学术体系的主要任务是探寻真理、发现规律、培养具备科学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学生（可以称之为“学术体系的再生产”）。知识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是全人类在长期历史中所形成的知识层积。知识体系既有系统性，又有非系统性。系统性体现在学科有自己的基本原理、核心概念、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学术规范；非系统性体现在学科永远在自我革命、自我超越、自我迭代，永远在边际上进行创新，推陈出新，不断突破现有的边界和定见，重新定义学科的现实。学术训练体系不仅要把理论、方法和规范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具有理论创新的勇气和能力。学术体系的核心是学术生产力，我们有什么样的作品（著作、论文、研究报告），作品产生了什么样的理论贡献，这是学科的内在竞争力。

最后，话语体系的主体是学术话语、政治话语、政策话语及其跨界传播，核心是话语影响力。话语是建构我们认知方式的系统和结构，话语决定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话语不同于语言，话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话语实践奠定了知识的基础。福柯把知识定义为“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学科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②当我们使用一套话语的时候，我们已经接受这套话语背后的价值观，服膺于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认为：“权力和知识是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③话语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关系，而不是思想的自由展现，权力支配着话语的运作、产生与传播。话语体系的核心是社会影响力，



一个国家的学科学术能不能深刻影响其他国家的学科学术，这是学科的外在竞争力。

学科主体性、学术生产力和话语影响力构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铁三角”。学科主体性是自主性的根基和源泉，学科的良好发展和科研人才的集聚，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设施。学术生产力特别是具有原创性理论贡献的科研产出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标志物，也是学科内部认同与外部承认的主要依据。话语影响力是自主知识体系基于理论成就和理论自信而形成的外显魅力，是中外学术界竞争与对话的结果。

世界知识网络中的跨国分工、 竞争与对话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与嵌入性是互为前提的。嵌入性自主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世界知识网络的跨国分工、竞争与对话中逐步生成的。知识天然是需要流动的。流动的知识才是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知识。在全球化时代，知识的流动必然是跨国界、跨学科的，普遍性知识取代地方性知识成为世界知识网络的主导力量。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社会科学亦如是。不可否认，在全球的知识社群中还存在着等级制分工，西方学者占据知识生产的上游或制高点，第三世界的学者则负责知识生产的原材料整理或初级加工。第三世界学者完成的许多学术研究，往往只是西方理论的注脚，为西方理论提供一个本土化的证据或证明。中国学者必须摆脱这种知识生产不对等的困境。

一方面，中国学者需要由理论消费者向理论生产者转化，从理论“补课”迈向理论原创，实现中国学术的“价值链升级”，推动全球知识社群的平等分工。我们需要

有这样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抑或其他西方国家，都是一个田野，一个具有理论建构潜力的田野；不同的田野各自具有信息优势，还可以实现视角互补。西方不等同于理论，中国也不等同于田野，要跳出“西方理论+中国案例”的思维陷阱，也需要反思域外理论的意识形态预设乃至偏见。以往我们更多是学习和应用西方的理论，现在中国学者应该更多地“走出去”直接观察和研究西方社会本身，将“理论化的西方”祛魅为“经验化的西方”，克服把西方作为“尺子”来丈量中国社会的从属心态，这样才有平等分工、平等对话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绝不能简单地排斥西方理论。是否接受某种理论，与理论的原产地无关，而是取决于该理论是否具有充足的解释力。如果该理论对中国的现象毫无解释力，应当拒绝之；如果该理论对中国的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解释力不够充分，应当加以修正和补充；如果该理论对中国的现象具有充分的解释力，我们则应该心悦诚服地应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理论一旦产生并经受了事实的检验，就变成了全人类的共同知识。

中国学者与域外学者的学术竞争应该是一种良性竞争，不轻信盲从，不闭目塞听。我们应始终保持倾听与对话：学习、引用和应用具有广泛解释力的域外理论，对域外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中外理论进行嫁接与综合，在交流中不断优化理论分析的框架，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范式革命做好理论储备。

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既需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也要避免浮躁、浮夸、好大喜功的心态。欲速则不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的许多学术概念源自西方，是对西方概念的转译，诸如“哲学”“科学”“技术”“自然”“社会”“干部”“群众”“阶级”“民主”“社会主义”“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概念已经完成了本土化或中国化，就如同佛教与禅宗的关系。诚如郁建兴所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是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实践的社会科学知识，其本质仍然是抽象化反映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科学知识，其功能仍然是理解、解释甚至引领人类社会运行。”^④

自主知识体系也需要从概念和理论起步，概念就好比是知识体系的砖瓦，理论就好比是知识体系的内部结构。概念为我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提供了化繁为简的认知工具；理论揭示了不同概念及其指代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在概念的原创方面，中国学术界其实已经积累了一批具有解释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概念，譬如差序格局（费孝通）、天下体系（赵汀阳）、儒法国家（赵鼎新）、以礼入法（瞿同祖）、行政集权民主制（曹沛霖）、政治形态（林尚立）、单位制（路风、李路路、刘建军等）、家户制（徐勇）、职责同构（朱光磊）、锦标赛模式（周黎安）、压力型体制（荣敬本）等。当代中国还有许多具有理论创新潜力的现象，譬如政治协商会议中的“政治界别”对于政治学的代表制理论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精准扶贫”对于人类反贫困事业意味着什么？“群众路线”对于政党理论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什么样的样本价值？“政策试点”与“渐进式改革”对于第三世界的发展是否具有广泛的借鉴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和普遍意义是什么？在这些原创性概念的基础上，还需要超越“概念孤儿”的状态，让“概念孤儿”成家，以推动概念建构的体系化。这就意味着要把概念纳入知识体系和知识网络之中。^⑤

任何国家的自主知识体系都只是世界知识网络的一小部分，是该国知识分子基于全人类共同知识进行理论创新的产物，这种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也不是为了自主而创新，而是基于现实需要和问题导向，是为了解决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真实问题，是为了满足研究者的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大国崛起需要开放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开放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孕育自主知识体系。只有走出狭隘的学术民族主义，同步嵌入全球知识网络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知识生产才能实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学科体系建设要聚焦人才队伍和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立足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创造良好宽松的学术环境，让学者将主要精力投入重大问题的长线研究，真正做出有原创性、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无论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现实（中国式现代化），都为中国研究和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一个经验“富矿”。如何把“中国经验”转为“普遍理论”，这是当代中国学人不容推卸的使命。

学术体系建设要聚焦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构建以原创性为核心的评价指标体系，从以量取胜转向品质为王，让优秀的自主知识成果得到应有的认可和重视；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鼓励百花齐放，支持跨界合作，在政府奖励体系之外，鼓励学会、大学、社会团体等主体建立民间奖励体系。既要有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有组织科研，也需要以个人兴趣为导向的个体化科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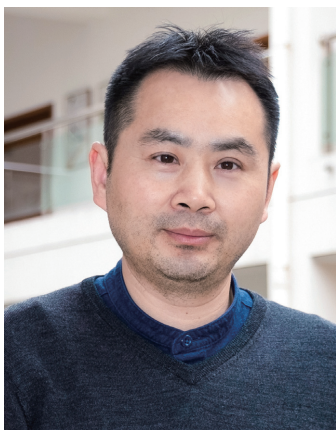
话语体系建设要聚焦中国学术“走出去”，加强与跨国、跨学科的知识社群的交流互动，善于将政治话语、政策话语转译为学术话语，做好学术话语、政治话语、政策话语的海外传播，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议程设置。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需要国际化的叙事能力，更需要贯通中西的理论功底和学术想象力。

注释：

-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181页。
- ②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03页。
- ③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9页。
- ④ 郁建兴、黄飏：《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意义》，《政治学研究》2023年3月。
- ⑤ 徐勇：《从田野政治学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开放时代》2023年第1期。



我国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均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旨趣，乃是顺应时代的要求。对历史最好的继承方式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正是《中庸》所强调的文明传



① 冯契：《哲学讲演录·哲学通信》，《冯契文集》（增订版）第10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15页。

承开新意义上的继承之道：“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当代性召唤中国特色，而要了解中国特色，就需要了解其中包含的两个层面的变革：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度越古今之别；由中国特色见出生成于其中的“世界性”。

探本寻源，涵养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品格

“三大体系”有其“本”“源”。本者，生活实践，源者，思想渊源。“三大体系”建设当归本生活实践，扎根生活实践，扎根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实践。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我国历史上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将为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和广阔的空间。然而，实现“必将”向“实然”的转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此有自觉的意识，并且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将工作方式真正回归到生活实践中。

传承开新：贯通“三大体系”的内外之道

刘梁剑，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三大体系”建设当赅续中华优秀思想渊源。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何以“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因为没有来自实际问题的真实灵感，因为没有充分重视中华优秀思想文化的当代价值。如何克服此弊？归本生活实践，同时对中华优秀思想文化传统进行“双创”工作，即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源离不开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传统，既包括从先秦开始的古代传统，也包括自19世纪中叶以降逐步形成的近现代传统。对于传统，只有在传承创新之中才能真正据为己有。如冯契先生所言，“对一种有价值的学说，后继者只有通过它才能超过它，也只有像小鸡一样破壳而出，才真正吸取了鸡蛋的营养”。^①在此，我们看到了连续与创新以及守成与创造的有机统一。没有创新就无以连续，没有连续亦无以创新；非守成无以创造，非创造无以守成。

“三大体系”建设的使命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反对“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这绝非拒斥中华文明传统之外的其他文明传统。需要改变的，不是向其他文明传统学习的做法，而是要改变学习方式，从单纯的模仿输入转向自主的批判性学习。易言之，对于外来文明传统，我们也应该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籍此“双创”将外来文明传统据为己有，实现外来文明传统的本土化与中国化。进而言之，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度越东西之别，这正是“中国特色”的真正意义。

“三大体系”建设当探本寻源。这是一项充满创造性和创新性的任务。这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涵养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同时也要求我们创造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充分发挥独立自主精神的思想环境。就前者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不惟书，不惟上，惟实励新，惟理是问。就后者言，我们应倡导百家争鸣的风气，建立保障自由探索的制度。

合内外之道， 构建“活泼泼”的贯通体系

上文辨明“三大体系”建设当探本寻源。然则，探本寻源当如何具体开展？

探本寻源，需“合内外之道”，构建“活泼泼”的有机体系。“活泼泼”一词借自宋明理学。《中庸》第十二章引诗“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程子评之曰“活泼泼地”，可谓善解。“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生动描绘了一幅天道流行、上下昭著的“活泼泼”的图景。天道如此，人道亦当如此。“活泼泼”的学问是动态的，“惟变所适”，随着生活实践的变化而不断生发、不断创造。学问只有处于运动之中，才有可能是客观的；学问一旦静止下来，就会变得主观，静止的学问是教条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均具有内外双层结构：内层，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外层是体系化的组织与制度建设。内外两层，分别以话语和学科为重心，而以学术为内外耦合的纽带。虽有内外之别，无内则无外，无外则无内；内外不相合，则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不能“和”起来成为一个“活泼泼”的、有机的贯通体系。

“三大体系”之外层，体系化的组织与制度建设，兼学科和学术而言之。“学科体系”建设首先是针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布局而言的。哲学社会科学现有的学科体系深受现代西方模式及苏联模式的影响。寻源者，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的学科分类是否有合理性，是否可能重新进入当下的学科体系。比如，近几年，随着经学研究的复兴，经学如何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学科体系便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探本者，反思现有的学科体系是否适应当下的社会实践。以哲学学科为例，哲学学科内部包括诸多二级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哲学”“应用伦理学”等新的二级学科应运而生，然而哲学问题的深入研究越来越需要打破二级学科的界划，进而溢出哲学一级学科的框框，打通文史哲、科学与哲学，如此等等。泛而言之，唯有破除固有学科界划，才能为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生发打开必要的空间。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在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又需要不断达到学科自觉，确定自身的

学科身份，在变动的学科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落入外层的“学术体系”建设，旨在为开展学术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构建、优化服务于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组织机构和制度文化。在这一层面，“学术体系”建设之探本，需要思考现有的学术建制是否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包括高校的学术生产机制，高校、社科院、智库的分工与合作，学术期刊与学术生产、学术评价之间的关系，如此等等。“学术体系”建设之寻源，则需考虑传统学术建制，如传统书院制度、师友讲学活动的当代价值。

“三大体系”之内层，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兼话语和学术而言之。落入内层的“学术体系”建设，其要义在于，学术的原创性和主体性。一个领域的研究要成其为学术，系统义理的建构是必要的工作，包括厘清问题意识、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提出核心观点并加以系统论证，围绕概念簇、意象群建构具有内在关联的义理系统。

概念簇和意象群的建构密切关联着“话语体系”建设。从名实关系来看，话语体系建设的探本意味着以实正名。话语是名，经验世界是实。“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庄子·齐物论》）言要合乎“所言者”（实）而后当，但所言者是不确定的。实在变，名也需要“惟变所适”，做出相应调整。不过，一般说来，名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实的变化，由此出现名不符实。为克服之，我们需要重释旧名，或另立新名。此外，名对于实的滞后还表现为，名引导我们迷恋停留于过去之实。因此，为了与“实”俱进，我们要善于解读中国实践与人类实践，事上明理，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如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基于对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考察，



提炼出“差序格局”这一富有中国气象，且对中国传统社会富有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堪称典范。

传承开新，锤炼“活泼泼”的话语

如何找到与实相适的名？这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寻源工作着重思考的问题。约略言之，其途有三：或承旧词而袭其义，或因旧词而变其义，或另创新词而通其义。

承旧词而袭其义。在强调变之前，我们需要先“退一步”，看到变中有不变，学科中固有的概念，如果依旧与实相应，那自然是有必要沿用的。另一个极端，则是完全找不到一个现成的语词与实相应，这时，不得不另创新词而通其义。在现代汉语中，人们往往用双音节词来表达概念。与古汉语常用单字表达概念相比，两个单字的组合一方面更加准确，或者说，更具有分析性，另一方面又相当灵活，从而给创新词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较之“承旧词而袭其义”“另创新词而通其义”，“因旧词而变其义”处于居间的位置。一个名（概念），有词有义。学科现有的名词，可以赋予其新义，从而将之打造成一个新概念（新名）。经过创造性的阐发，旧词重新焕发生机，成为我们解释与改造现实世界的理论工具。例如，在教育学中，“学习”除了通行的知识导向意义的内涵之外，可以加入中国传统“学以成人”的向度，从而使它成为一个新概念。又如，牟宗三标举“具体的普遍性”，以区分通常所理解的“抽象的普遍性”。“具体”本来指特殊的事件，现在却被用来讲普遍的真理。经此“辗转引申”，“具体”就成了一个新名词。^①旧词也可以是其他学科现有的概念。比如，叶澜先生从生物学借来“基因”概念，将之改造为阐发教育学理论的新词。

这启发我们，打造新概念可从学科交叉中获得灵感，由其他学科中借用概念并加以转化，将之打造成一个有解释力的新概念。旧词新说，具有经济而“不费”的好处。当然，由于旧词自有旧义，且旧义约定俗成，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了根，很容易遮蔽我们试图赋予它的新义。

旧词也可以是还没有被某学科用作专门术语的传统话语或日常语言。中国式哲学社会科学的运思需要“活的语言”。我们应当有效实现中国思想传统话语的创造性转化。这可以接续我们身在其中的传统，从中国深厚的思想传统中汲取解决具体问题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智慧。运用这样的概念工具，思考者比较容易有亲切的体会和情感上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连续性，有些日常语词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非常紧密。这样的语词便兼有日常语言和传统话语的妙处。例如，费孝通先生晚年沉思人类多元文明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用“场”的概念与意象解释不同文化间的关系。“场”既是一个表示地点的常用词，同时又跟中国传统的“气”思想密切关联。用“场”来说道理，大家自然感到亲切，与生活世界不隔，与中国思想传统也不隔，可以说同时接上了生活世界之“本”和中国思想传统之“源”。

综合而言，“三大体系”需内外相合。体系化的理论建构所成就的理论“体系”也应该是“活泼泼”的贯通体系而非封闭的体系。封闭的体系遵循典型的现代体系建筑术，以极少量的基本概念为基石，以极少量的基本原理为梁柱。它在形式上完成于写作结束之时，而它的内容甚至在写作开始之时就已完成。相形之下，“活泼泼”的体系是未完成的，既在写作中生成，又向着生活实践保持开放。面对“代际跃迁”的历史大变局，我们需要传承开新，放弃属于过去时代的封闭体系，转向探索属于新时代的“活泼泼”的体系。险路漫漫而光明兮，吾人将上下而求索。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基础研究”(21JZD018)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3—35页。